

体大思周的

文心雕龍

左健◎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
文化
百科

中华文化百科（16） 卞孝萱 主编

体大周思的文心雕龙

左健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大周思的文心雕龙 / 左健 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399-0

I . ①体… II . ①左… III. ①文心雕龙—通俗读物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192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印 张：12

字 数：91.8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0 元

目 录

一、刘勰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5
1. 从“七龄梦彩”到老来焕发的一生	5
2. 主导思想：“随仲尼而南行”	9
3. 《文心雕龙》的著作动机及其成就	11
二、本原论	16
1. “原乎道”	16
2. “师乎圣，体乎经”	21
3. “酌乎纬，辨乎骚”	26
三、文体论	34
1. 文体论的内容和意义	34
2. 文体的体制原理	40
3. 文体写作的基本要求	45

四、创作论	57
1. 构思论	57
2. 体情论	70
3. 技艺论	82
4. 风格论	95
五、批评鉴赏论	107
1. 刘勰以前的批评鉴赏论	107
2. “音实难知”与“知实难逢”	110
3. “博观”与“六观”	114
4. “圆该”与个性趣味的二律背反	120
5.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131
六、文学发展论	135
1. 质文代变	135
2. 文变染乎世情	140
3. 学术思潮	143
4. 君王的提倡和爱好	144
5. 继承与创新	147



中华文化百科（16） 卞孝萱 主编

体大周思的文心雕龙

左健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大周思的文心雕龙 / 左健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399-0

I. ①体… II. ①左… III. ①文心雕龙—通俗读物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192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印 张：12

字 数：91.8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0 元

目 录

一、刘勰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5
1. 从“七龄梦彩”到老来焕发的一生	5
2. 主导思想：“随仲尼而南行”	9
3. 《文心雕龙》的著作动机及其成就	11
二、本原论	16
1. “原乎道”	16
2. “师乎圣，体乎经”	21
3. “酌乎纬，辨乎骚”	26
三、文体论	34
1. 文体论的内容和意义	34
2. 文体的体制原理	40
3. 文体写作的基本要求	45

四、创作论	57
1. 构思论	57
2. 体情论	70
3. 技艺论	82
4. 风格论	95
五、批评鉴赏论	107
1. 刘勰以前的批评鉴赏论	107
2. “音实难知”与“知实难逢”	110
3. “博观”与“六观”	114
4. “圆该”与个性趣味的二律背反	120
5.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131
六、文学发展论	135
1. 质文代变	135
2. 文变染乎世情	140
3. 学术思潮	143
4. 君王的提倡和爱好	144
5. 继承与创新	147

一、刘勰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1. 从“七龄梦彩”到老来焕发的一生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其祖父一代避乱南渡，“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就是在京口出生、长大的。关于刘勰的生平和家世，史籍留下的文字很少，主要见于《梁书·刘勰传》。《南史·刘勰传》据《梁书》删改而成，然其删改之处，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本传介绍，勰父刘尚，曾任刘宋时越骑校尉，官小职微，在刘勰幼年就去世了。^①因父亲早逝，孤儿寡母，生计艰难，以至于“家贫不婚娶”（本传），早年贫困的生活经历对他一生的思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于刘勰的家世，有一桩公案应说明一下。据《梁书》本传载：“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秀之是刘宋开国重臣刘穆之的从兄子；又据《宋书·刘穆之传》，穆之乃“汉齐悼惠王肥后”。按此追溯其谱系，刘勰一族乃汉高祖刘邦之后裔。历来研究者皆持此说。首先对此提出质疑的是王元化，他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中指出：“至于世系表（按：指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所制刘勰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

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②不仅如此，《南史·刘勰传》还删去了《梁书》本传中“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句话，就是说，不仅“高祖后裔”说不可靠，就连刘勰家跟刘秀之的关系也值得怀疑。中国人素重家族渊源，祖先中有帝王将相者，莫不彰明于文字引以为豪。屈原《离骚》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首先推出自己古帝王之后的身份。淡泊超脱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不仅称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但凡历代祖先中稍有功名者如陶舍、陶青、陶侃等，莫不一一引介。在南朝，一个人的门第出身如何对他的政治前途大有影响，若《宋书》、《梁书》所说属实的话，在刘勰的经历和文章中不会对此毫无反应，《南史》也不会将这些当时人很看重的东西轻易删去。此外，在南朝其他史籍中，没有发现刘勰一家几代人与刘秀之有任何瓜葛，再结合刘勰本人不得志的一生，都可以说明，刘勰出身庶族才是更为可信的。

刘勰虽然家道中落，幼小失怙，但他自小就有抱负。《文心雕龙·序志》说：“予生七龄，乃梦彩若锦，则攀而采之。”这象征着一个七岁的孩子，对前程的一个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克服困难，“笃志好学”（本传），在学问方面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约二十岁时，他的母亲又去世了。在三年丧毕的第二年，为了开拓人生新的

出路，或许也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刘勰辞别京口来到帝都建康。不久，投定林寺僧祜门下。定林寺是当时有名的大佛寺，僧祜亦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他曾于齐永明中，奉旨入吴宣讲佛法，同时他还“造立经藏，搜校卷轴”，对佛经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这样大的工程，自然需要许多人手。刘勰入定林寺，大约在前六七年内主要协助僧祜编辑整理佛典，并在这方面做了可观的成绩，成为僧祜的得力助手。《南史》本传说他“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除了编辑整理佛经，他还写了不少碑文：“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可见他的佛学造诣和文章才华，起码在当时的佛界之中已有不小的影响。

刘勰虽身在庙宇，但仍心系儒门，本拟注释五经，后转为论文。大约在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经过四年的努力，位的著作大功告成。尽管刘勰自己对这本书很有信心，但因他身份低微，文名未显，故而此书未被人们所注意。为了求得知音，立身扬名，他打算请当时最有声望的文坛泰斗沈约审评《文心雕龙》，但他没有资格和途径正式拜见沈约，于是就背着书稿，扮成一个贩货的，在沈约车前拦驾献书。沈约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本传）刘勰身怀重宝拦道而求知音，沈约伯乐识马而称许《文心雕龙》，成为文坛佳话。此后，刘勰及《文心雕龙》渐渐为世所知。

也许由于这一原因，天监二年(503)，三十七岁的刘勰“起家奉朝请”，不过奉朝请并非正式官职。《宋书·百

官志》曰：“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奉朝会请召而已。”天监三年，被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管理文籍，这才正式进入仕途。后来历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在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任上三年，“政有清绩”（本传），说明他还颇有行政才能。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品位也不算高。他虽兼任此职，但直到天监十六年才入东宫，深得爱好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的爱重。《梁书·刘勰传》：“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萧统编纂《文选》，内容体例多与《文心雕龙》相合，虽然刘勰不一定亲自参加商榷，但萧统受到《文心雕龙》一书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③

在这一段时期，刘勰还积极参予政事，以期实现自己“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的平生素志。他曾向梁武帝上书，建议不仅宗庙祭祀不用牛羊用蔬果，而且天地、社稷之祭也应改用蔬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不久，他又被提升为步兵校尉之职，但他在这一任上不过一年就结束了。其离职的表面原因是由于天监十七年五月僧祐去世，他留下的佛经整理工作还需要人去完成，刘勰自是最合适的人选，“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本传），实际上为他的仕途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普通二年(521)，刘勰撰经工作已经完成，时已五十五岁，再次出仕已无希望，于是请求出家为僧，“敕许之”，改名为慧地。昔日刘勰依僧祐门下，虽身在空门，但并未受戒入教，是其仍怀“待时而动”（《程器》）之心。这次出家，“先燔须发自誓”，行为非同寻常，内心必有说不出的苦衷。果然，出家不到一年就与世长

辞了。刘勰生年，《梁书》、《南史》均无说明，历来持论不一。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认为刘勰“生于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按此推算，刘勰一生大约活了五十五或五十六岁。

2. 主导思想：“随仲尼而南行”

刘勰一生兼修儒学与佛理，思想中既有儒学的成份，也有佛家的影响。问题是，他一生中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撰写《文心雕龙》时的主导思想又是什么？学术对此持论不一。

认为刘勰思想以佛家为主者，当以饶宗颐为代表。他指出：“总之，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家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但不少学者还是认为刘勰虽受佛家思想之浸淫，但观其一生，还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陈汉《刘勰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吗？》一文以“入世”与“出世”作为儒、佛两家在处世态度方面的分水岭，认为儒家注重生前的功名，主张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得志，泽加于民”、“达得兼善天下”；而佛家则认为现实世界是空无的、虚幻的，是充满灾难的“苦海”，要求信徒们对世间万物不起执著之心，要“内止其心，不滞外色”。因此，很难想象一个“笃信佛理”的“虔诚的佛教信徒”，是会时刻想着要到社会中去谋取功名，并千方百计付诸行动的。^④有的论家说刘勰信佛，主要根据就是他身居寺院多年，潜心佛典，长于佛理。其实，“长于佛理”并不能同“笃信佛理”划等号，研究并精通某

一学说的人，不一定就是某一学说的信徒。而刘勰对于儒家就不一样了。他不仅精通儒经，而且对儒家的圣人表现出了无限的信仰和崇拜之情。《文心雕龙·序志》曰：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梦到孔子是那么地兴奋不已，倍感荣幸；想追随圣人之后，成为儒家信徒的心情又是那么地迫切、溢于言表。孔子说，三十而立，他连做梦的年龄也是那么地契合圣人之教。周勋初先生在《刘勰的两个梦》中对这段话还作了这样别具一格的解释：刘勰与孔子都是北地鲁人，而刘氏家族避乱南迁世居京口，正有一段“南行”的经历。他所以托言梦随孔子南行，当是巧妙地利用了与孔子的同乡关系，“表示他是一个儒家学派的信徒，追随孔子之后，准备宣扬儒家教义于南土。”^⑤

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在“文之枢纽”的前三篇中有集中的表现。他对儒家圣人和儒家六经的揄扬可谓不遗余力。《原道》篇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征圣》篇云：“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既体现于文艺的社会功能观，也体现于文学史观与文艺内部的某些艺术

范畴。

至于佛学思想，作为哲学世界观在刘勰的思想中可能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文心雕龙》中，其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范文澜从《文心雕龙》一书体系完备、结构精密着眼，认为刘勰“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勰理明晰若此。”（《文心雕龙·序志注》）有的学者认为其影响“并不在思想观点上，而在于推理论证和组织结构上，即佛学的因明学的影响。”（参见孙蓉蓉《〈文心雕龙〉的产生和形成辨析》）此外，六朝玄学盛行一时，道家思想对刘勰也不会没有影响。比如，《文心雕龙》在许多地方都使用“自然”这一概念，究其内涵，也与道家“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思想有关。

3.《文心雕龙》的著作动机及其成就

刘勰一生除《文心雕龙》外，他一生中还写了些别的文章，主要是为寺庙和名僧撰写碑文，这些文字都失传了。现存的文章有两篇：《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都是宣扬佛法的。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文心雕龙》的著作动机及其成就。

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说，前二者往往受社会现实的限制而难以实现，惟有“立言”一道较易为个体所把握。刘勰出身庶族，家境贫寒，虽有“奉时骋绩”之幻想，但前途渺茫，故而他不能不重视“立言”这一途径。《序志》篇云：“夫宇宙绵邈，黎献纷

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宇宙无穷，人生苦短，“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才能“腾声飞实”，传名于后世。若要建言，最好是注释儒经，但因为汉代马融、郑玄诸位大家已经“弘之已精”，于是就“搁笔和墨”，转而论文。

不过，刘勰撰写《文心雕龙》，除“建言”的动机外，当时文坛浮靡讹诡的风气也是促使他论文的另一个现实动因。《序志》篇云：“……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檠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定势》篇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情采》篇云：“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坛弊端若此，照理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应当担负起时代重任，力挽颓风，拨乱反正。可遗憾的是，自魏晋以来，论文之作虽然不少，但批评的水准却不能令人满意。《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异，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所以，他觉得论文应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文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各种表现形态，从而扫清文弊，